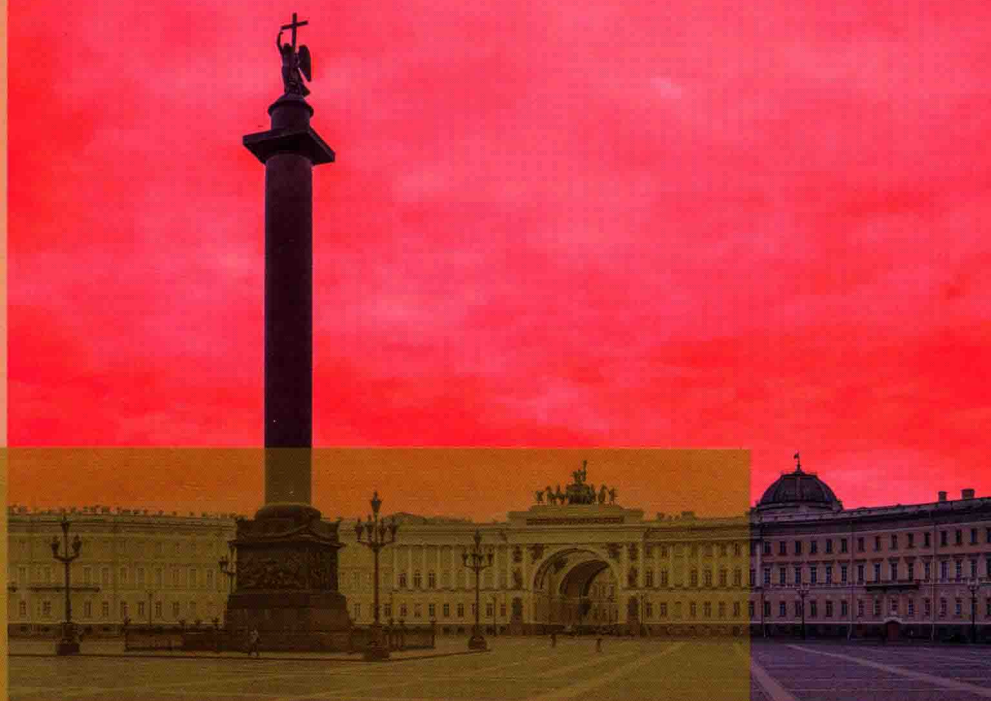




历史社会学概论

(美) 理查德·拉赫曼 著 赵莉妍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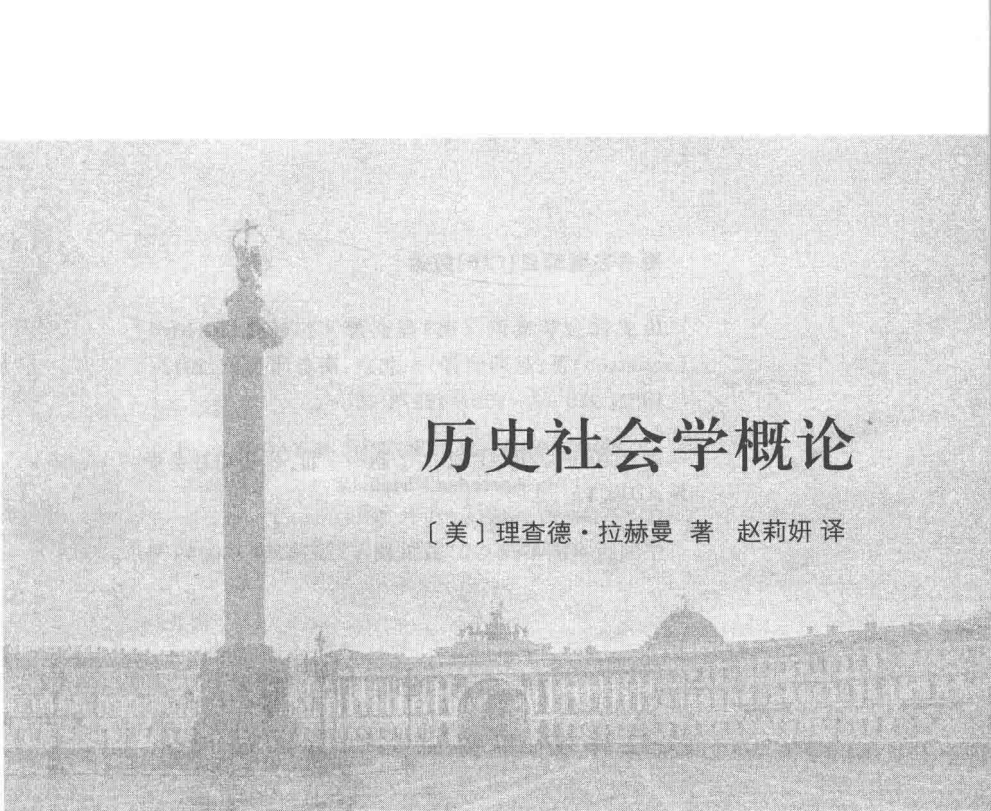
WHAT IS
HISTORICAL SOCIOLOGY



创立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历史社会学概论

〔美〕理查德·拉赫曼 著 赵莉妍 译

WHAT IS
HISTORICAL SOCIOLOGY



创立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7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历史社会学概论/(美)理查德·拉赫曼(Richard Lachmann)著;赵莉妍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ISBN 978-7-100-12378-5

I. ①历… II. ①理… ②赵… III. ①历史社会学
IV. ①K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60093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历史社会学概论

〔美〕理查德·拉赫曼 著

赵莉妍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978-7-100-12378-5

2017 年 1 月第 1 版

开本 880×1230 1/32

2017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4 1/4

定价:25.00 元

WHAT IS HISTORICAL SOCIOLOGY

Richard Lachmann

Copyright © 2013 by Polity Press

根据美国政体出版社 2013 年版译出

谨以此书献给我的姑母露丝·贝克尔(Ruth Becker),
她始终鼓励我激发求知的欲望。

目 录

致谢	1
第1章 开篇	3
第2章 资本主义的起源	17
第3章 革命与社会运动	31
第4章 帝国	55
第5章 国家政权	70
第6章 不平等	84
第7章 性别与家庭	101
第8章 文化	111
第9章 预测未来	124
注释	136
参考文献	139

致 谢

感谢格奥吉·杰尔卢吉扬(Georgi Derluguian)、罗伯托·弗朗佐西(Roberto Franzosi)、不知姓名的书评人,以及政体出版社的编辑乔纳森·斯凯里特(Jonathan Skerrett)提出的宝贵建议。特别感谢丽贝卡·艾米(Rebecca Emigh)的详细修改意见。

第2章的少部分内容此前曾出现在以下文章之中:《未经阶级斗争的阶级形成:向资本主义过渡的精英理论》(“Class Formation without Class Struggle: An Elite Theory of the Transition to Capitalism”,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3], 1990年,第398—414页);《单一社会形态中的对比:佩里·安德森〈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评赏》(Comparisons within a Single Social Formation: A Critical Appreciation of Perry Anderson's *Lineages of the Absolutist State*, *Qualitative Sociology*, 25[1], 2002年,第83—92页);以及《国家与权力》(政体出版社,2010)。第4章的部分内容曾发表在《詹姆斯·马奥尼〈殖民主义与后殖民发展:从比较研究视角看西班牙统治下的美洲〉专题论丛》(Book Symposium on James Mahoney's *Colonialism and Post-Colonial Development: Spanish America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Trajectories: Newsletter of the ASA Comparative Historical Sociology Section of the 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23[2], 2012年)第22—24页“评论”。第8章的部分内容曾发表在《国家与权力》(政体出版社,2010)以及《强力推荐!帕斯卡尔·卡萨诺瓦的〈文学世界共和国〉》(Read This Book! *The World Republic of Let-*

ters, Pascale Casanova, *Trajectories: Newsletter of the ASA Comparative Historical Sociology Section*, 18[1], 2006 年), 第 15—16 页。

第1章 开篇

为了对历史变迁加以阐释,社会学应运而生。社会学的创立者们相信,他们正身处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社会转型期之中,需要一门新的学科来描述和分析这一变革、解释其起源、探索其对人生的意义。正如托克维尔(Tocqueville)([1835]2003,第16页)所说:“全新的世界需要新的政治科学。”对于这一变革的性质以及所创立的学科应当如何研究该变革,创立者们的意见并不一致。他们并不确定,其所构想的、意在解释自身所处变革时期的理论能否用于开创一门综合性的“社会的科学”。尽管如此,所有创始人——马克思(Marx)、韦伯(Weber)、涂尔干(Durkheim)以及知名度不及他们的同时代学者——都认为社会学这一新学科具备历史性。

社会学之所以在创立之初便具备历史性,与创立者们所提出的问题直接相关。

马克思提出的主要问题包括:什么是资本主义、它何以取代其他社会制度、它怎样改变了人们在诸如工作、繁衍、社会再生产、汲取知识和探索自然世界等各方面的方式?这些改变对权力、统治和剥削之间的关系有何影响?

韦伯的问题也与划时代的历史变革有关。他寻求阐述世界宗教、资本主义和理性行为的起源;探寻此种理性如何影响权力行使、科学(包括社会科学在内)、宗教和人文的发展、如何影响职场、政府、市场和家庭的组织运行以及如何影响人类其他方方面面的活动。

涂尔干期望解答的,则是劳动分工及由机械团结向有机团结的

历史转变如何改变了职场、学校、家庭、团体以及整个社会的组织情况、如何影响国家发动战争的能力。¹

社会学这一历史性学科与划时代的社会变革息息相关,自创立之日起便日益关注当前时代、尝试阐述个体行为。儿童图书《关于我的一切》(*All about Me*)(克兰兹[Kranz]著,2004)为小读者们预留了空白的页面,可以写下他们在“最喜欢的地方”想做的一切,介绍他们的爱好,或者写出“三样你认为重要的东西”;与之相似,许多社会学家,特别是美国的社会学家们,期望从个人经历或身边事物中寻找研究课题。我们来看一下美国社会学协会(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年度会议的议题。它从社会学的角度描述了人的一生。首先我们来到人世,众多人口学家解释了我们的母亲在26.2岁而不是在25.8岁生育的原因;伴随着我们性意识和性冲动的产生,社会学家不断重温自己的青春岁月,研究失贞或同性恋的课题。成年之后,有犯罪学家在一旁提醒哪些街头青年会打劫我们、哪些会在糟糕的城市学校里学坏。而医学社会学家可以解释为什么我们会在年老糊涂时用药过量、诊金高昂。这一研究的绝大部分内容都不具备历史性和对比性,所关注的对象正是眼下的美国。

与此同时,更广阔的世界中则发生着根本性的转变:尽管数十亿人口快速消耗着资源,已经令全球生态系统不堪重负,二十世纪的全球人口却仍在空前增长。不久一些国家便将面临全国性的水荒,或淹没在上升的海平面之下。全球变暖迫使人口大量迁移,其规模之大堪称人类历史之最。而对于如何安置难民,政府既缺乏组织能力,又没有行动动力;事实上,很多政府反而在民众的支持下诉诸武力,驱逐贫苦移民。

如今,继制造业和农业之后,服务业的从业人员也正在被机器操作所取代,其可能的结果便是不需要目前的大部分劳动力参与,还能

够保持当前或未来的生产水平(柯林斯[Collins],即将出版;布莱恩约索姆[Brynjolfsson]与麦卡菲[McAfee],2012)。战争的性质也正在发生着改变。大规模征兵出现在18世纪末期,形成了百万士兵征战沙场的局面,也推动着国家政权发展军工,所开发的武器既能一次消灭数千名敌兵,也能杀害为军队制造武器、输送新兵的平民。而在过去的半个世纪,几乎所有西方国家都取消了大规模征兵,有的不再发动战事,有的则转而依赖高科技武器。

经历了四十年的经济衰退之后,过去的三十年间,世界上最富裕国家之间的不平等程度日益加剧;与此同时,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处于美国和欧洲统治之下、深陷贫困境地的一些国家,则实现了地缘政治的高度自治,与西方国家之间的经济差距迅速缩小。在我们所生存的这个地球上,与世隔绝的群居人口越来越少;起初,在富裕国家,农民数量减少,仅占总人口的一小部分,而这一现象如今也出现在世界其他大部分国家和地区。世界绝大部分人口都生活在城镇之中,这在人类历史上尚属首次。按照马克思最初的阐述,剥削关系随着资本主义的出现而建立起来,而如今其中则加入了不同形式的交流联系,使得在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可能形成更为均等的关系。

就分析法和方法论而言,社会学更适用于分析21世纪初转型期的内涵,这与其创立的初衷不谋而合——用于阐释伴随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出现而产生的空前颠覆性变革。但是,只有借助历史社会学,我们才能够理解当代社会中意义非凡、影响深远的那些内容。克拉格·卡尔霍恩(Craig Calhoun)(2003,第383页)的说法很准确:“历史社会学因何存在?最具说服力的理由便是它在研究社会变革方面具有重大意义。这个理由很明显,但同时又是一个尴尬的存在(因为很少有人意识到它的存在)。”

目前的社会学教科书涵盖的都是唯我论的狭隘研究形式,它们也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占据了各大学术期刊的大量篇幅;而写作本书的目的便是将我们的注意力从这些研究上移开,转为关注如何通过对历史变革的社会学分析,去理解我们所处的当代世界的起源以及当前转型的范围和结果。由于目前的大量相关研究局限在历史社会学的分支范畴之内,因此本书必须检视历史社会学的含义。我希望,借助历史社会学所关注的问题、采用的方法以及领会的内容,我们能够推动广义的社会学学科的发展,使之重新成为一门研究社会变革的学科,而不仅仅局限于对静态社会关系的模型展现和人种学描述。

本书以及历史社会学这一学科都无法帮助你了解关于你自身的一切。但历史社会学将帮助你理解所生活的这个世界。它所展现的环境背景将有助于确定诸多事物当前变化的程度和意义,包括两性关系、家庭结构、人口统计模型,还包括职场、经济、文化、政治和国际关系的组织与内容等。由于历史社会学具备内在对比性,我们能够发现包括我们所处的社会在内的任一特定社会在每一时刻的不同寻常,去分辨基本的社会变革与单纯的新鲜事物之间的差别。

如果说当代社会学已经与学科创立者们的设想大相径庭,那么早期的社会学也有别于史学家们笔下的历史。由于马克思、韦伯和涂尔干都曾试图阐述一种单一的、前所未有的社会变革,其结果便是轻视、甚而忽视了近代之前发生的大部分世界史实。他们还敲定了将哪段历史作为研究对象、如何通过他们提出的元理论和基本概念以演绎的方式来理解他们所检视的历史证据;随后便在众多历史学家的著作中探寻查找,并往往对后者的研究结果断章取义,从中提炼出有关社会变革的广义论点。当社会学理论飘忽无根基,脱离了文献证明、脱离了赖以阐明自身与相互关系的特定时间和地点,专业史家们便会轻易地忽视社会学理论,这也不足为奇。而这一切所导致的结果,便是韦伯和涂尔干及其理论对历史学家的影响微乎其微。

涂尔干很容易被历史学家忽视,因为他几乎从未引证或应用过任

何特定的历史事件。曾广泛引用过历史研究的韦伯则吃了苦头——几乎研究宗教改革运动的所有当代历史学家都拒绝接受他最知名的作品：《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费尔南德·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1977，第65—66页）恰如其分地总结了历史学家们的看法：“这一理论站不住脚，尽管没有尝试彻底摆脱它，但所有的历史学家都对它持反对态度。十分明显，它是错误的。”结果，历史学家们在研究其他历史变革、需要理论或实证指导时，都不愿去参考韦伯的理论。

马克思在历史学家中的口碑要好得多，或许是因为他并没有被归入社会学家之列。但是，将自身定义为马克思主义者^①或期望吸收借鉴马克思主义要素的历史学家在参考马克思的论点时，大多是自己从事的特定历史时期和历史问题研究提供资料。马克思的首要研究课题便是阐述资本主义的起源或在全球甚至国家层面上探寻资本主义的发展动态，但鲜有历史学家认为自己应对这一阐述做出贡献。

马克思、韦伯和涂尔干的理论也受到了欧洲以外学者（以及清楚了解世界其他区域的历史和思想传统的西方学者）的挑战，质疑他们这些理论想要阐述的转型期“全然不像一段‘人类普遍史’”（查卡拉巴提[Chakrabarty]，2007，第3页）。查卡拉巴提与其他“后殖民”学者一样，将早期的社会学理论及其后由欧洲和北美学者发展的理论看作是“隶属于欧洲历史的若干片段……源自特定的思想和历史传统，丝毫不具备普世效用”（同上，第xiii页）。或者如迈克尔·达顿（Michael Dutton）（2005，第89页）所说，“当涉及亚洲地区的研究时，只要提到‘理论’，就一定会被理解为指的是‘应用理论’，只在有助于以更具说服力的方式讲述‘真实的’故事情节时才具有价值，其原因究竟是什么？”我写作本书的目的之一便是探求“西方的”历史社会学能够在何

① 本书中的“马克思主义者”均指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者。——译者注

种程度上研究世界其他地方的社会变革,同时分析世界“其余区域”的理论和研究如何丰富、深化和挑战源自欧洲和关于欧洲的社会学理论。

过去的几十年间,历史社会学家努力缩小自身与历史学家之间的学术成就差距。但这两门学科并未合而为一。当一位志向远大的学者决定将历史社会学、而不是历史学,作为自己的研究目标和事业发展方向时,这一决定将关系到他们会成为哪一种知识分子、将进行什么样的研究。历史社会学家与历史学家之间时有互动,但他们的大部分时间还是在向各自学科内的学者学习、面向他们的需求。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历史学和社会学各有各的发展沿革,以往的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在知识、制度和职业发展方面所做的决策确定了如今在每个学科内将提出什么问题、运用什么方法、分析哪些资料、提出哪些观点。许多历史学家的著作影响着社会学家,部分历史社会学家也赢得了社会学家的尊敬,但在实践中,两个学科的学者研究历史的方式颇为不同。本科生、甚至硕士生,往往都并不清楚这些差异,在选定研究方向时并未全盘考虑所做的选择会带来什么影响。我在写作本书时,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为了揭示从事历史社会学研究的含义,从而帮助那些正在考虑研究这一方向的读者们理清思路,明确了解作为社会历史学家从事这一领域的学术研究究竟意味着什么。

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对历史学家的概括贴切准确:他们“坚持将时间和地点作为区分的基本原则”(1991,第87页)。举例来说,18世纪的法国大革命与20世纪的中国革命截然不同,因为发生的时间更早、所处的地域不同。因此,在对大部分历史学家加以区分以及当历史学家自我定义时,往往以他们所研究的特定时间和地点为标准,并且其研究活动围绕相应的时间节点和地理分界展开。这些时空的分界在全球范围内符合并“稳固扎根于制度实践之中,这些制度实践逐步塑造出了单一民族国家,同时也见证了历史学系中教学、聘任、

升迁和文章发表方面的组织与安排”(查卡拉巴提[Chakrabarty], 2007,第41页)。当前世界各地的史学专家大多这样区分:19世纪美国史、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史、20世纪中国史或者其他类似的时空区分方法。相较于世界其他区域历史,历史学系通常聘用更多专业人士研究本国历史,并进行更细致的划分。因此,美国的历史学系往往拥有十余位研究学者,其中还有一位专门研究内战军事史,研究中国历史的就只有一位;而在中国的院系中可能只有一两位研究美国历史,而十几位学者则每人专攻一个中国朝代。

对历史学家进行国别划分的意义在于,他们“所提出的主要问题大多以国家政治为基础”,这引领着历史学家们应用“档案资料……来找出关键行动者并归结出这些行动者的态度与动机”(蒂利[Tilly], 1991,第87—88页)。然而,历史学家的国别划分也影响并限制了他们在何时、以何种方式跨越时空界限进行比较对照。“历史学家们不习惯于进行大规模的比较、甚至不习惯于从事整体研究,或许也未曾真正接受相关训练。他们往往以自己专攻的特定时期为出发点去看待过去整个时代”(伯克[Burke],2003,第59页)。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曾在一篇题为“印度真的存在吗?”(Does India Exist?)([1986]2000)的文章中举了一个很贴切的例子,说明国家划分如何影响对历史的思考。沃勒斯坦注意到,我们今天所见到的印度由多个单独的领土合并而来,形成于18世纪和19世纪英国的殖民统治之下。印度的政治统一,以及文化统一,都是英国对整个次大陆的殖民统治产物。沃勒斯坦提出的观点是:

这是一个反事实的命题。假设……英国主要在古卧莫尔帝国建立了殖民地,称之为印度斯坦;而法国同时统治了现今印度共和国的南部(主要指达罗毗荼)地区并称之为达罗毗荼。那么

我们今天是否还会认为马德拉斯“历史上”便是印度的一部分：甚至我们是否还会使用“印度”一词？……那样的话，或许世界各地的学者们将会撰写内容翔实的大部头著作，证明“印度斯坦”和“达罗毗荼”自古以来便代表着两种不同的文化、种族、文明、民族等等。（同上，第310页）

当前印度的统一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其中包括英国殖民统治、民族独立主义者对英国统治的反抗以及其他帝国主义势力（例如，曾试图殖民但未成功的法国）未能在印度次大陆抢占势力范围等等。沃勒斯坦认为，一系列的偶然事件与未发生的无效事件共同促成了一个政治单位、一个学术领域（印度研究）的出现，它们所影响的不仅是对英国殖民时期及其后时代的研究，还包括对之前数百年、即统一的印度政体或文化尚不存在之时的历史和文化研究。如果过去三百年中出现了其他不同的偶然事件，那么不仅当前的现实情况将有所改变，而且历史学家对久远过去的追溯解读也会不尽相同。

而历史社会学家则与之相反，围绕理论问题开展研究工作和职业生涯——例如，革命的原因何在？如何解释政府为民众提供的社会福利中存在的差异？家庭结构如何随时间而变化、为何变化？这些问题与马克思、韦伯和涂尔干所提出的近代社会变革问题一样，无法仅仅通过关注单一国家的单一时代而获得答案。因此，在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的阐述之中，历史本身所起的作用迥然不同。举例来说，历史学家并不认为，了解了法国人民在1789年大革命期间的表现之后，将能够更深入理解中国人民在1949年革命期间的表现。而社会历史学家则将每次革命视为一连串事件的结果，在阻止其他事件的同时提供某些行动机会。因此，对社会学家而言，1789年的法国人民和1949年的中国人民都抓住了机遇，各自的革命活动都源于此前发生的事件；这

些事件形成了某些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并结束了其他的社会结构与关系。社会历史学家所关注的是比较此革命与彼革命在结构和事件上的差异。在社会学分析中,共性的重要程度高于个性。社会学家系统分析各自的差别,试图找出能够解释每个结果的模式;其目的在于创立理论,用以阐述更多案例、解释共性与个性的各自成因。

因此,历史学与历史社会学的区别便在于两个学科不同的发展方式。然而,针对历史学与历史社会学的区别提出本质主义观点却是错误的。两个学科的业内人士都会认可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 1991,第86页)的观点:“社会进程具有路径依赖性——此前事件的次序限定了在特定时间点上所发生的事件——就这一意义而言,有关次序的历史知识至关重要。”换言之,历史学家和社会历史学家都致力于阐述社会行动者如何受到他们自身此前以及前人所作所为的限制。正如马克思在他关于历史分析的最伟大著作《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The Eighteenth Brumaire of Louis Bonaparte*)([1852]1963,第15页)中所说:“人们创造自己的历史,但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

马克思所表达的正是历史学家菲利普·艾布拉姆斯(Philip Abrams)所描述的“社会世界的两面性……在这一世界中,我们既是创造者,又是创造物”(1982,第2页)。人们在过往所采取的行动形成了我们所生活的这个社会世界、这一世界又在诸多方面限定了我们的愿望、信念、选择与行为;而我们所进行的历史阐述解释了我们如何作为人类历史活动的产物。同时,我们作为行动者创造了历史,又在世界上本已存在的变革空间之内建立了新的社会秩序。变革行为对我们有何限定、我们又在变革行为中有何机遇,都由历史决定。我们所受的限制及所面临的机遇不同于前人;而我们的行为确保了后人可能